

论寻根文学主体的构成及特点

陈丽芬

(南京大学文学院, 南京 210093)

摘要: 寻根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流派, 鲜有人对它的主体进行研究。它的主体包括作为寻根先导的少数老作家、寻根主体部分的知青作家和寻根独特部分的少数民族作家。由于寻根文学作者不同的独特感受和各自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审美理想追求, 使他们在主体的不同类别里又有区别。老作家的寻根主要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爱好有关, 其寻根更多地带有不自觉的特点; 而知青作家的寻根是出于身份认同的需要和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合适的接受场, 因此担当寻根文学主体重要角色的不是文化底蕴深厚的老作家, 而是文化底子薄弱的知青作家。而少数民族作家的寻根既是对长期封闭心理的反拨, 也是对民族文化沉落的焦灼, 还不免带有踏入世界文学潮流的急切。

关键词: 寻根文学; 寻根文学主体; 老作家; 知青作家; 少数民族作家

中图分类号: I24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0)06-0115-05

寻根文学主体的寻根, 从根本上说, 反映了人性中固有的一种基本情感和心理特征, 即人作为思维主体, 具备了自己的种族记忆、文化积淀和反思能力。人类从拥有自身历史和能够自我反省时起, 就具备了追忆和追思远古的天性。远古神话传说里普遍存在着原始的“八风回回, 凤凰啁啾”的和谐记忆和与此相关的“失乐园”情结。寻根者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对原始生活的崇敬, 不过是这个主题的现代变奏。但是, 由于寻根作者不同的独特感受和各自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审美理想追求, 使他们在主体的不同类别里又有了区别。

一、少数老作家

少数老作家主要指年龄和创作资历老或较老的一批作家, 如汪曾祺、陆文夫、林斤澜、邓友梅、冯骥才等。20世纪“80年代初, 在政治性较强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之外, 出现了一批另辟文化新路的文学作品, 艺术观照的文化视野渐渐取代单一和既定的政治视野, 地域文化、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一时成为作家们开掘的富矿, 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热’悄然兴起, 出现了汪曾祺的苏北乡镇风情小说、陆文夫的姑苏风味小说、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小说、邓友梅与冯骥才的京、津文化风味小说等。这类创作, 貌似与社会政治现实拉开了距

离, 实则是把反思的触角深入到民族文化层面, 并悄然启动了文学赖以衡量自身的审美价值目标。从文学流向来看, 它们形成了寻根文学的先声”^[1]。汪曾祺、陆文夫等一批老作家不自觉地担当起开创寻根文学先河的角色。

这批老作家的不自觉寻根更多地出自自身原因, 主要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爱好有关。

首先, 他们见证过中国的传统生活, 不少作家又因为“右派”身份, 沉沦过底层。如: 汪曾祺, 出身士大夫世家, 从小受传统文化濡染, 与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 陆文夫和邓友梅都曾被错划为“右派”而下放基层, 接触了各行各业、各式各样的凡人小事。陆文夫, 江苏人, 独特的姑苏地域环境和人文精神深深影响了他, 使他对苏州的文化民俗有着很深的感悟体察。邓友梅 12岁参加抗日战争, 被骗往日本当劳工, 九死一生; 经历了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淮海战役, 直到百万雄师过大江占领南京, 尔后从事文学创作, 被划为“右派”, 四处劳改, 被迫停笔 22年……一波三折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就是这种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善于观察人世的眼和善于描摹人性的笔。在他笔下, 那五、画儿韩、索七的遭际浓缩了人世的酸甜苦辣, 小胡同里上演着一幕幕人生的悲喜剧。

其次, 他们的文化修养包括阅读积累、个人嗜好等, 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如汪曾祺, 曾师从沈从文, 受其风格影响, 对乡土中国

收稿日期: 2010-04-13

作者简介: 陈丽芬(1983-), 女, 湖南郴州人, 博士研究生, 从事戏剧戏曲学研究。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和淳朴的民风民情十分向往;冯骥才,从小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和球类活动,1960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市书画社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术、地方风俗等产生浓厚兴趣;陆文夫,一辈子津津乐道于烟、酒、茶、吃,尤其是吃,他对各地富有特色的民间小吃很有兴趣,总有品不足、尝不够的感觉,正因为如此,江南市镇的传统文脉尽收他的笔下。

再次,从现实创作需要来讲,他们的寻根是为了在政治反思小说千孔一面的主流氛围中突出自己的审美个性,从而转向自身熟悉的故土,开始了描写民风民俗的文化小说创作。

除此之外,还有更为深层或内在的原因,即中国现代小说形态自身传统的一脉承传。在中国新文学传统中,原本存在着一种或隐或现却绵延不断的文化小说传统。从周作人、废名、芦焚、沈从文、老舍、萧红到孙犁等,其作品都以关注乡土文化和民间风土的个性而闻名于世。虽然他们的创作从来没有取得文学主流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审美个性成为当代文学文化小说的先导。他们与当代小说家也有着一种渊源性的牵连。沈从文是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老舍等“京派”小说之于邓友梅,孙犁等“荷花淀派”之于冯骥才,都有一种自觉与不自觉的艺术承传或艺术影响的关系。

他们的这种创作心态使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没有自我性地为这一文学现象命名,也没有群体意识;二是对传统文化的褒大于贬,有明显的返回传统的倾向,即使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也不时陷入欣赏的迷津,意识上的批判和下意识中的把玩并含互存。

二、知青作家

在主张或参与了寻根的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处于知青年龄段上,其中主要的寻根作家都有知青生活或类似的经历,因此一部分知青作家便成了寻根文学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作家有韩少功、阿城、郑万隆、李杭育、王安忆、李锐等。

知青作家“之所以会走向文化寻根,一方面是由于身份认同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现代主义实验遭遇意识形态制约后的逃逸策略需要,试图借助民族传统包装,含蓄表现正在形成中的现代意识”^[2]。在这一点上,知青作家群体与汪曾祺、陆文夫、林斤澜、邓友梅、冯骥才等一批老作家有所区别,其文化寻根不是向传统复归,而是为西方现代

文化寻找一个合适的接受场。

1 “文革”的背景培养了反思和自省素质

“文革”的记忆是知青作家的切身遭际,这种成长背景培养了他们性格中反思和自省的素质。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到拨乱反正的历史反思,再到深化改革时期对“文化断裂”的深沉忧患,他们的奋斗和思考始终表现出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顽强的进取精神。这种反思和自省的素质很自然地转化为他们创作中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使他们扮演起民族文化先知与拯救者的角色,勇敢地将“重铸民族文化”、“再造东方文明”这样的历史使命揽到自己肩上。

2 寻找自身“知识分子”价值的文化品牌标志与中国文学希望找到民族个性、确立民族身份形成同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是知青作家群体走向成熟的时期,一方面,他们参与民族话语抒写,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他们也期望在民族文化资源的寻找中,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

“文革”的动乱造成政治上的幻灭在他们心灵上留下深深的创伤,知识反动论造成知青作家对知识的隔阂,知识上的缺氧又造成他们文化上的贫血,使他们在文化上有着深层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使他们亟须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证明他们存在的意义。返城后,随着他们境遇的改观和成就的取得,他们开始启动实现其自身作为“知识者”价值的对象化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完善自我形象的塑造,于是寻找一种属于他们自己文化品牌标志的需求显得格外迫切。而为了弥补社会阅历有限、文坛资质不足之劣势,他们就利用自己下过乡、有过民间生活的亲身经历之优势,向历史遗存中找寻,到地域文化中打捞,并通过这些来触摸散失在民间的文化之根。

西方文学思潮的大量涌进与借鉴,渐渐使作家们发现失去个性后的自我空虚。郑万隆在《我的根》中说:“这些‘实验’,有些在西方成功了。那是因为它在西方。而我的根是东方。东方有东方的文化。”^[3]李杭育也认为:“中国的文学总该有点中国的民族意识在里边,这个说法大约是不过分的。”^[4]于是,他们以返回和深入民族自我的方式对追随西方文学的潮流作出反拨,并对世界各民族文学向本土本民族文化传统回归的趋势作出顺应,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寻找民族之根,对民族重新认识,建树一种东方的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思维和审美体系。

于是,知青作家寻找自身“知识分子”价值的文化品牌标志与中国文学希望找到民族个性、确立民族身份形成同构,促使知青作家成为寻根文学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漂浮在城乡之间的“局外人”的双重经历,使他们对城乡两种文化差异之体会尤为深刻

知青作家有着城乡两种生活经历,对处在同一生存大环境里的城乡两类文化,他们都有切身的体会,尤其对两种文化差异之体会更加深刻。一方面,他们感受到民间的愚昧和落后,希望现代文明的改造;另一方面,他们看到现代文明的负面性,希望从民间文化、原始文化中反思现代性。

返城以后,既往的乡村生活远退为背景,眼前的城市又变得陌生,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熟悉的那个城市了。社会处于复杂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在新旧文明冲突和交替的转折关头,人性中尚古情绪才会表现得异常激烈。人们担心正在失去的是否完全无意义,怀疑将要到来的是否真有价值,以至在失落感和疑虑重重中滋生批判现代文明和返璞归真的思想。当他们感到未来既没有救赎,也未必是进步,不确定性的召唤声中祸福参半,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人们究竟要被带到哪里去,谁也无法说清。这样,回头寻找来路,以求从困顿和迷失中解脱出来,于是,自然地开始对以往的乡村生活以及失落的青春理想产生了一种回望和依恋,只有暂时回到那里,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和精神的安逸。

同时,由于返城后境遇的改观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使他们回忆往事时获得了一种放松的心情,乡村生活审美价值的一面才重新被他们估量。这也使他们意识到,在乡村文化中还保留了大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财富,当一些知青作家意识到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造成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十年“文革”更是对传统毁灭性摧毁后,他们经验中对乡村民间文化的信仰便提醒他们扎根到民间文化的土壤中,从那里汲取营养,以延续传统文化和文学生命之根。

知青身份的这些特点使知青作家的创作呈现出自己的优势:相对于那些“土著作家”或农裔城籍的作家,知青作家摒弃了创作过程中可能导致对农村的历史产生偏颇的感情联系,突破了从农民文化、乡村文化的内部视角来观察和审视的局限,以一种清醒的理性目光审视着农民、农村及农村文化的表现,把批判的锋芒逼向其身后那一片积淀着厚厚的历史尘埃的乡土,而且要扮演着在民族范畴里

透视“乡土中国”脉相的“先知先觉”者。但是,这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利方面,即先入为主的创作姿态和明显的主题暗示法。

三、少数民族作家

少数民族作家作为寻根文学主体的独特群体,其代表作家有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藏族的意西泽仁与扎西达娃及多杰才旦、回族的张承志、蒙古族的白雪林、土家族的蔡测海、满族的边玲玲、哈尼族的存文学、壮族的岑献青等。由于对少数民族作家的研究向来薄弱,这里就多论述一些。

少数民族作家由于其生存环境和身份背景的特殊性,使他们带着强烈的民族自尊、自强意识,带着高度的民族责任感的民族意识,对民族发展的重要问题,比汉族作家有着更为深沉的忧患意识。再加上少数民族文化在制度化的文化整合下,长期处于压抑和封闭状态,这使得他们的寻根有着更为复杂矛盾的特点。他们的寻根既是对长期封闭心理的反拨,也是对民族文化沉落的焦灼,还不免带有跻入世界文学潮流的急切。这些特点具体可以结合其主体意识特征来进行分析。

1 双边文化意识与回抱自身传统文化

在汉族文化和汉族作家一贯具有压倒优势的国内文化格局中,少数民族作家感到无法回避的强烈辐射和炙烤,对本民族文化的衰微表现出忧患意识。“十七”年时,国家采取制度化的文化整合,对过去的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上,既缺乏开阔的科学视野,也缺乏深邃的鉴别目光。加之“左”的思想的影响,对涉及宗教、巫术、仪式、禁忌等原始形态的东西,视之封建落后;涉及性爱等人伦关系的,视之不健康;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这些遗产的文化价值。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也使得人们生活中的一些习俗受到抑制,甚至发生变化,对年轻一代来说,不了解更不熟悉过去民族生存的一些习俗、仪式等,使之产生文化断裂的感觉。少数民族作家,常有一种面对汉民族强势文化的焦灼和本民族文化弱势的忧患。

因而少数民族作家普遍具有双边文化意识,而又热衷回抱自身传统文化。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表现,比汉族作家有着更为得天独厚的条件。独特的民族文化土壤,养育了少数民族作家独特的精神气质,使他们同本民族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强烈认同本民族的文化精神。而寻根文学对少

数民族文化等非规范文化的大力提倡,既是在西方话语霸权下的民族身份认同的需要,也为少数民族作家光大和发扬本民族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拉丁美洲和非洲文学的崛起,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来说,也是一种启迪、一声召唤,使之看到民族文学振兴的希望,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心。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冷静地回顾自己民族的文化,更深入地研究本民族的历史,深入到民族生活中去寻找开拓属于自己民族的东西。于是,少数民族作家回到自己文化的流脉中,并随着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进步,以自己民族独特的文化视角、文化姿态对民族生活的进步加以描绘,从中折射出本民族世世代代的理想和品格。

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始终发生着关系,始终相互影响着,每一民族文化传统正是在对他者的关系过程中、在矛盾变化中逐渐发生变化,从而形成新的文化系统。因此,处于文化认同危机的少数民族作家,如果选择走简单的回归传统的道路是不行的,现实中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道路可选。为了将本民族传统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保留和发扬光大,就必须思考本民族文化的现代进程,探索本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融合道路。

但是,在寻求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融合之路时,他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一系列文化命题:要平衡洋为中用、他为己用过程中的心理态势;要把握好自我保存与顺应历史潮流间的文化分寸感;要处理好时代艺术观念与本民族艺术传统间的“异质同构”和“互译性”关系;要正确解决本民族文化精神(包括历史、现实及未来命运)揭示与汉语表述过程的文化生成问题;还要从灵魂的深度扮演好一个本民族历史命运的“转写者”和文化精神的“翻译人”的文化角色;等等。

2 宗教思想的影响

宗教对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在生活和精神上的影响要比汉族作家深刻得多。由于现代生活、现代科学文化的冲击与影响,各少数民族的宗教观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保守着古老的信仰。但是,作为民族文化精英的作家,他们对宗教一般是具有现代的进步眼光和态度的,只有正确地理解和表现宗教生活,才能把握民族精神的脉动。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他的中篇小说《丛林幽幽》里就刻画了一位老萨满的形象,生动描写了老萨满“进入常人难以领悟的人神双体的萨满世界”。但这位萨满不是蒙昧的化身,相反,他身上的神秘是古老蛮荒文化积淀的神

秘,是鄂温克族善良和智慧的化身,更是民族命运的预言者。作品准确地反映了原始宗教对人类精神的影响,并揭示了作为鄂温克民族文化传统最远古的形态与今天民族心理的有机联系。张承志在《黑骏马》《心灵史》等一系列作品中,对民族信仰的坚持、对理想的追寻以及为生存而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作了深入剖析,展现了回族的民族性格和心理素质,具有震撼力。

3 诗性智慧的含纳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寻根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中国少数民族中流传着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史诗、叙事诗、歌谣、谚语等,有些在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是一种活的文化。人类在原始的生存中,其文化意识是万物有灵,以巫术仪式沟通人与自然力的关系,有神秘的、言之不尽的意味。维柯在《新科学》一书中将之称为诗性智慧。现代理性的发展,越来越倾向机械与数学,系统有序的生存使诗意消失殆尽。寻根文学提倡恢复人的生命感受的活力,恢复诗性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中保存着大量诗性文化因素,因此在宗教的、民俗的、牧猎的生活中,很容易含纳接近诗性文化的内容。这些都使少数民族作家在寻根文学创作中具有拥有题材的优势。

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生存环境偏远,其文化思想大多保持在自然状态,社会思想单纯,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小,文化的遮蔽也相应较少,因此少数民族作家较容易接受新思想、新观念,而富于创造性。再加上少数民族的自然景观、富有原始色彩的地域文化风貌、滞重的宗教习俗迁延,以及西方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侵扰,使少数民族作家在生存的文化背景下获得了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神韵的某种天然契合。因此,在寻根文学进行横的借鉴时,少数民族作家对外国现代派的理解和接受,是比较快捷且相当娴熟的。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吸取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通过夸张、变形,把历史、现实和未来交织起来,使人物和情节产生象征意味;回族作家张承志在《大坂》《绿夜》中,采取意识流手法,叙述角度不断地在主观“我”与客观“他”之间转换,把喧嚣的都市的欲望与大自然的宁静和谐纠结在一起,流露着现代人的生存失落感。

4 少数民族作家的寻根与中国文学寻求民族身份认同、希望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形成同构互补的关系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无法规避“文化混血”

的历史命运, 随着以汉语文化为主的中国历史的演进与时代的发展, 少数民族作家创作正逐步摆脱过去反映单一民族较单纯、质朴的生活内容、生存境况和人生追求的状态, 努力转向在当今多种文化交汇互渗后所形成的更为繁复交错、混融杂呈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对本民族文化变迁过程中诸多文化因素和时代特征的揭示。其中, 有的作家作品甚至完全脱离了传统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化生活领域, 进而广涉到对更为广泛的时代文化和普遍意义的人生万象的描述、探讨与透视中; 而有的少数民族作家, 或日渐远离, 或已经失去, 或正在丧失其原有的母语及母语文化体系, 他们偶尔对本民族文化表现出的依恋和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寄托, 更多是来自不可否认或难以否认的血统, 有的是出自生命归属感的寻找而进行理性、自觉的民族认同, 而那种来自血脉深处的种族记忆和地域特征, 那种属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天赋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 在他们身上已荡然无存。

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的多元特点, 使他们先天拥有多元共生、互融互补的文化传统, 更能深刻理解文学创作中文化的“异质同构”所蕴涵的重大意义, 这与中国文学寻求民族身份认同、希望在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形成同构互补的关系。

除了以上三类文化身份的作家外, 还有一类是农裔城籍的作家, 主要代表作家如贾平凹、路遥等。

这些作家都出身并成长于农村、山野, 后来又身居城市, 他们虽然深知故土的贫穷、艰辛、愚昧、野蛮、落后等阴暗的一面, 渴望现代文明的改造, 但更多的却怀有对故土的深厚感情。乡村对于他们童年的滋养是难以磨灭和不容改变的, 在感情上他们始终难以认同城市, 在血缘和精神上始终同乡村故土保持着无法割舍的联系。来自农村的生命根性和在城市喧嚣、冷漠的反照下, 使他们产生返回故土的寻根意向, 他们的寻根是由被抛于城市的疏离感、孤独感所激发, 是他们移居城市后精神缺失的一种代偿心理。

故土情结常常无意识地转化成偏袒故土和农民的情感精神, 甚至违拗作家的理性批判精神, 使他们的作品常常化为故土的诗化写意。这些审美化了的因素更多的是热烈的情感宣泄和温馨的灵魂抚慰。

参考文献:

- [1] 郇忠民.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思潮 [G] // 王嘉良, 颜敏.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下册.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183-184
- [2] 陈晓明. 表意的焦虑 [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98.
- [3] 郑万隆. 我的根 [J]. 上海文学, 1985 (5): 44
- [4] 李杭育. “文化”的尴尬 [J]. 文学评论, 1986 (2): 50.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bject of Root-seeking Literature

CHEN Life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As a literary school, the root-seeking literature seldom gets research on its subject, including a few veteran writers acting as root-seeker forerunners, some educated youth writers who are the main body of root-seekers and the writers of minority nationality who are the special part in this school. It distinguishes in the subject of the root-seeker writers in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owing to the root-seekers' distinctive sensation and different appreciation of beauty and ideals. The veteran writers' style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experiences which have more characteristic of unconscious feeling. But for the educated urban youth, their root-seeking comes from the identification requirements and seeks for the suitable acceptance sites for the western modern literature. We could find such a strange phenomenon: the relatively-weak educated urban youth writers act as the main body and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is root-seeking tide, comparatively not the experienced writers with deep culture knowledge. In addition, for the minority writers, their root-seeking is not only the modification to the long-term closing mind but also the concerns for the falling of the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y are eager for the access to the world culture tide.

Key words root-seeking literature; the subject of root-seeking literature; veteran writer; educated youth writers; ethnic minority writers

[责任编辑 张莲英]